



文物承载灿烂文明,传承历史文化。中国历史悠远,地大物博,走进博物馆,便能触摸到这里的

历史文脉与基因。坐落于黄河之滨的甘肃省博物馆,凭借陇原大地丰厚卓异的文化底蕴,汇集了甘肃境内从远古时期到近现代的大量文化珍宝,尤以新石器时代之冠的甘肃彩陶、汉代简牍文书、汉唐丝绸之路珍品、佛教艺术珍品、古生物化石等珍贵文物独具特色。它们实证了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,生动诠释了百万年人类史、一万年文化史、五千年文明史历程中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和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。

甘肃省博物馆馆藏一级文物687件(组),其中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中的甲类(国宝级文物)有16件,它们均出土于甘肃省境内,承载着甘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,是甘肃在多元一体的中国古代文明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、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的绝佳“代言”。



八思巴文虎头银符铁牌



莲花形玻璃托盖



铜奔马

# 细数甘肃省博物馆镇馆之宝

□ 茹实

## 1. 冠绝“彩陶之乡”: 鲋鱼纹彩陶瓶

鲋鱼纹彩陶瓶,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(距今5500年-5000年),甘谷县西坪出土。器腹一侧正中用黑彩绘一只弯躯摆尾的鲋鱼,头部细节刻画颇似人脸,双臂、手指等亦具有人格化特点,或许具有人神合一的意味。有人认为该图案可能与传说中人文始祖伏羲有关,其神秘怪异的形象,或许是早期“龙图腾”之一。它不仅是甘肃省博物馆馆藏众多彩陶中唯一一件国宝级文物,也是“彩陶之乡”甘肃的唯一一件彩陶类国宝级文物。

## 2. 汉代木雕艺术的旷世杰作: 彩绘木六博俑

彩绘木六博俑,西汉,武威磨嘴子出土。木俑为两位跪坐对局的老者形象,二者间设一长方形棋盘。老者神情凝滞,蓄势待发,显然正在紧张的六博对局之中。考古发现中不乏汉代博局、棋子、骰子等六博器具,汉墓画像砖中亦常见相关图像,但以雕塑刻画六博对局却极为罕见,这件文物充分体现了汉代木雕艺术所达到的高度与境界。



《报父母恩重经变》图轴

## 3. 迄今发现最大的汉代木雕作品: 彩绘木轺车

彩绘木轺车,西汉,武威磨嘴子出土。轺车由舆、伞盖、御奴和马组成,是迄今为止发现最大的汉代木雕作品,也是现存汉代木轺车马保存较为完好的一件,对于研究汉代车舆和封建等级制度提供了极为难得的资料。据汉代制度,推断墓主人生前为六百石至千石的官吏。

## 4. 目前所见《仪礼》最古版本: 《仪礼》简

《仪礼》简,西汉,武威磨嘴子出土。分木质和竹质两种,共496枚,编为甲、乙、丙三本,系先后编写。甲本为《仪礼》17篇中的7篇,乙本仅存《服传》一篇,丙本仅存《丧服》一篇。该简册保存基本完好,与传世的郑玄注本不同,应是目前所见《仪礼》的最古写本,在版本校勘上有很高的价值,且书写工整秀丽,是汉代墨写隶书的上品。



《仪礼》简(局部)

## 5. 医学史上的重大发现: 医药简牍

医药简牍,东汉,1972年武威旱滩坡出土。共计92枚,其中木简78枚,木牍14枚。78枚简为一卷册,分为两种:一种宽度1厘米,边侧有缺口,是医治内科、外科、妇科及五官科的医方,还有针灸方面的刺灸医方及禁忌;另一种宽度0.5厘米,边侧无缺口,是医治各科疾病和疑难症的医方。14枚牍为一卷册,有二道编绳,先书后编。这批简牍内容丰富,保存医药方有30多个,所列药物近百味,是研究汉代临床医学、针灸学和药理学的重要资料,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。



## 6. 汉笔佳作: “白马作”毛笔

“白马作”毛笔,东汉,武威磨嘴子出土。竹制笔杆,端直均匀,管状中空,笔杆前部绑扎丝线且髹漆。笔芯及锋外覆较软的黄褐色毛,富有弹性。笔杆中部阴刻隶书“白马作”三字,“白马”为制作此笔的工匠名。笔尾端削为钝尖,便于簪插,出土时位于男尸头部左侧,是汉代文职官吏“簪笔”之制的印证。由于时代久远,汉代毛笔出土物极为罕见,这支制作精良、保存完整的汉代毛笔得以驰名海内外。



“白马作”毛笔

## 7. 傲世凌空 一骑绝尘: 铜奔马

铜奔马,东汉,1969年武威雷台墓出土。马作奔腾状,三足腾空,右后蹄踏一展翅飞翔、回首惊顾的飞鸟。奔马全身着力点集中于超掠飞鸟的一足之上,准确地把握了力学平衡。蹄踏飞鸟,表现出马行迅疾,在鸟惊回首的刹那已经超越了飞行的鸟。铜奔马铸造精美,构思巧妙,为我国青铜艺术中罕见的杰作,1983年被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,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(境)展览文物目录。它以卓越的艺术造诣千古生辉,成为中华民族勇往直前、积极进取伟大气象的象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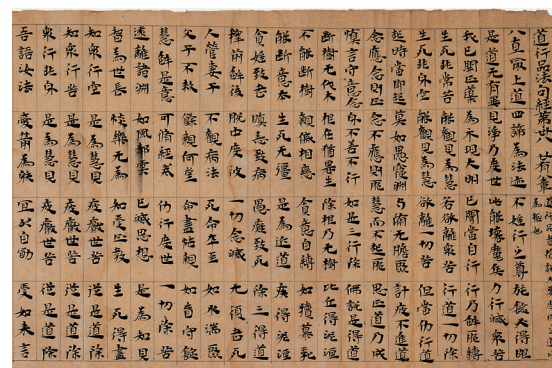
铜奔马

## 8. 现存敦煌文献中最早的经卷写本: 《法句经》

《法句经》,前凉,卷轴装写本,黄麻纸,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。以隶书缮抄《道行品法句经》第三十八、《泥洹品法句经》第三十九两品经文,前有裁切痕迹,题记“升平十二年(公元368年)沙弥净明。咸安三年(公元373年)十月廿日沙弥净明诵习法句起”,为沙弥净明的两次诵经记录。该文物是所现存敦煌文献中最早的经卷写本,其书法艺术展现了“经书体”楷法初期的特有风貌。

## 10. 唐代写经典范: 大般涅槃经卷三十二迦叶菩萨品之二

该写经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。用硬黄麻纸24张书写,保存完好。卷首题“大般涅槃经卷三十二迦叶菩萨品之二”,卷尾题“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二”。卷首下方题“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三日于右任敬观”。经文中“世”“慈”字均有缺笔,为避太宗李世民之讳,当为高宗年间所写。写经纸质入潢后打蜡研光,厚实平整。楷书修整自持,端庄严谨,数千字始终如一,不失行次,堪称唐代写经的典范之作,对研究当时佛学及书法艺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。



《法句经》局部

## 11. 佛教中国化的实物见证: 大云寺五重舍利宝函

大云寺五重舍利宝函,泾川县大云寺出土。最外层的石函由质地坚硬的灰色大理石制成,四壁阴刻《泾州大云寺舍利宝函并序言》,并有参与舍利发现和奉安仪式的官、僧题名,共千余字,纪年为“延载元年”(公元694年)。其内层层套置鎏金铜匣、银椁、金棺和玻璃舍利瓶,舍利瓶内装舍利14粒,形如米粒。这套舍利容器精巧华丽,光彩夺目,反映了盛唐时期金银细工的最高技艺。这套舍利容器是考古发现最早的以中国传统棺椁制度设计舍利容器,并置于地宫之中实例,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习俗相融合的重要实物见证。

## 12. 丰肌秀骨 盛唐气韵: 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

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,唐代,原位于天梯山第3窟左壁龛。主尊坐佛圆髻广颐,低垂下视,双唇紧闭,流露出一种庄严沉思的神情。身着通肩式袈裟,线条流畅,洗练写实,表现出衣饰质地的柔软厚重。此像经后世多次重妆,彩绘已然斑驳,但比例匀称,体态雍容,不失盛唐神韵。左右两侧胁侍菩萨面庞圆丰,神情娴静,庄重而不失妩媚,肌肉丰满匀称,体态优雅,正是唐代“丰肌秀骨”的典型。



彩塑木六博俑

## 13. 敦煌艺术绘画珍品: 《报父母恩重经变》图轴

该画为绢地设色,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。画面中心为说法图,一佛二菩萨法相庄严,诸菩萨、弟子、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等“赴会圣众”围绕周围。两侧及上方分布15幅经变故事图,以连环画形式铺陈展现《佛说父母恩重经》的基本内容。其上绘七佛、弥勒与七宝,其下墨书《佛说父母恩重经变》。绢画最下方自左向右排布地藏菩萨、《绘佛遯真经》、引路菩萨及比丘尼戒行遯真像。该绢画保存完整,色彩绚丽,是敦煌《佛说父母恩重经》诸变中,内容最复杂,画面情节最多,特点最鲜明,风格最独特的一幅,且有宋淳化二年(公元991年)明确纪年,具有重要的历史、艺术和研究价值。

## 14. 玲珑剔透 精美绝伦: 莲花形玻璃托盖

莲花形玻璃托盖,元代,漳县徐家坪汪氏家族墓群之汪惟孝墓出土。托盖为半透明玻璃质地,整体呈普蓝色,晶莹剔透,色泽纯正。由盖和托盘两部分组成。托为平口,八瓣莲花形边沿;盖为花口,由七瓣仰莲组成。该托盖完整成套,造型华美,展现了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和谐之美。

## 15. 元代“国际通行证”: 八思巴文虎头银符铁牌

八思巴文虎头银符铁牌,元代,符牌两面镶嵌八思巴文银字,译为“上天眷命,皇帝圣旨: 如不钦奉虔敬,治罪”。廓外上有叶状钮座,座内铸虎头纹,座顶有椭圆形环钮。这种虎符圆牌专为传递“军情急务”而设,持之可进出全国各地及四大汗国,域跨欧亚,故有“国际通行证”之称,是研究元代急速制度以及政治史、民族文字等方面的珍贵实物资料。这种符牌使用范围十分严格,故全世界现存数量极少。

## 16. 我国书法艺术宝库: 肃府本《淳化阁帖》

肃府本《淳化阁帖》,明代,采用陕西富平所产质量特优铜磬石摹刻,共计142块。《淳化阁帖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书法法帖,集宋以前书法之大成,编印于北宋淳化三年(公元992年)。此帖印数不多且刻版毁于大火,故流传的少量帖本成为稀世珍宝。明朝朱元璋第14子朱瑛就藩肃州时,获赐宋初拓印本淳化阁帖。肃王府一直视之为传代之宝,秘不示人。延至万历四十三年(公元1615年),方由著名金石篆刻专家历时七载完成两面刻文的帖石。这套刻石是现存时代最早、质量最好、保存最完整的一部淳化阁帖刻石,逼真再现了王羲之、王献之、张芝、钟繇、索靖及欧、褚、颜、柳等宋以前书法巨匠的精品,堪称我国书法艺术的一座宝库。(作者单位: 甘肃省博物馆)



高善穆石造像塔

## 9. 中国早期古塔实例: 高善穆石造像塔

高善穆石造像塔,1969年甘肃省酒泉市出土。宝盖、相轮、塔顶、塔肩、塔基一应俱全,底部有榫头。宝盖顶端中间刻北斗七星,塔腹阴刻《增一阿含经·结禁品》的前半部分及发愿文,有承玄元年(公元428年)纪年。塔基为八角形,每面阴刻一像,像左侧上方刻八卦符号。该造像塔是现存北凉石塔中保存最完整的一件,在造型上继承了键陀罗供养小塔的基本造型特征,又有了新的的发展,如塔顶端的北斗七星,塔基的八卦符号等,体现出佛教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碰撞和融合,是研究早期佛教艺术和佛教思想的重要标本。



大云寺五重舍利宝函 (本版图片由甘肃省博物馆提供)